

初明诗歌研究

第一章 初明诗歌概说

一、“四明”说

明诗是中国诗史的重要一环,有其具体的历史存在与文学价值。所谓明诗,无疑是以朝代为界的一种诗歌分期。如果严格按朝代兴废来论,上限可以洪武元年为断,下限可以崇祯十七年明亡为断,共二百七十六年的历史。然而由于历史发展的复杂性,史学家不能尽守此以论明史,诗论家亦往往不按此界限以论明诗。

元至正间,红巾军起事,形成与朝廷对立的龙凤政权。朱元璋、陈友谅、张士诚、明玉珍等政治集团崛起,促成群雄割据的政治格局,与历史上的三国时代多有相似处。元王朝渐失去“正统”地位,大一统名存实亡。史学家一般依据大一统标准区别时代,是有元、明之分。史学家谈明史,诗论家论明诗,或不局限于大一统是否已实现。如《明史·文苑传》采入诸暨王冕,钱谦益《列朝诗集》也收录王冕诗。王冕能否列入明诗人行列,存在争议。同时又有大量诗人,或依朱元璋,或依陈友谅,或依张士诚,不奉元之“正统”,我们称之“元诗人”,其或有不受。《列朝诗集》处理这类问题的方法,就是在“甲集”前设立“甲集前”之编,收录刘基归明前之诗与王逢、戴良、丁鹤年、王冕、黄公望、杨维禎等人诗。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明清易代之际。崇祯十七年,北都破,福王在南京建立弘光小王朝,满汉对立、南北并峙格局形成。明年清兵下南京,而唐王、桂王政权仍然存在,直到康熙元年,桂王朱由榔死云南,清王朝大一统才真正名正言顺。如果将福王、唐王、桂王政权下的诗人称为清诗人,亦或有不受。诗论家使用南明、明遗民诗人之说,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问题。朱彝尊《明诗综》即收录大量南明诗人与明遗民之诗。

如何认定易代之际诗人的身份,是一个错综复杂、难以措手的问

题。这里接受通常所说的明代上下限,即从洪武元年到崇祯十七年。对于易代诗人,则倾向于使用“入明”以作区别。如王冕不曾“入明”,可不必视为明诗人。这种做法固有弊端,但也有助于避免一些说法上的杂乱^①。

即以明代二百七十六年历史来说,史学家、诗论家也有不同的时期划分。按朝代庙号来分,依次为洪武、建文、永乐、洪熙、宣德、正统、景泰、天顺、成化、弘治、正德、嘉靖、隆庆、万历、泰昌、天启、崇祯。虽无太多疑问,问题是洪熙在位仅一年,光宗在位不到一月。史家称洪熙之史、泰昌之史,诗家谈洪熙之诗、泰昌之诗,难免拘泥。至于英宗复辟问题,当作何认识,也非易事。因此,论者或依据朝代长短权作区别,一种分法是洪武、永乐、成化、嘉靖、万历之诗各自成一段,余则合两朝或数朝之诗以成一段,如将天启、崇祯合称启祯之诗。

诗论家时常抛开年号断限,结合政治文化、时代风尚、诗歌潮流等,按时段区分明诗。通常采用三分法,即明初、明中叶、晚明。关于三分的上下限,各家观点不尽相同。当然,三分法不是清人的发明,明人论明诗已常使用“国初”、“盛明”、“晚近”一类说法了。此外,还有五分法等。近人宋佩韦《明文学史·引言》就提出明代诗文可分五个时期:“一、明开国至永乐初;二、永乐初到成化、弘治间;三、弘治、正德之际;四、嘉靖、万历之际;五、从天启初以迄明清之交。”^②

明诗分期之法互有长短。这里提出一种四分法:初明、盛明、中明、晚明。

初明,或者说明初,始洪武初,终宣德末,共约七十余年。诗坛名家辈出,如《明诗纪事》甲签序所云:“凡论明诗者,莫不谓盛于弘、正,极于嘉、隆,衰于公安、竟陵。余谓莫盛明初,若犁眉、海叟、子高、翠屏、朝宗、一山,吴四杰、粤五子、闽十子、会稽二肃、崇安二蓝,以及草

^① 陈田《明诗纪事》甲签卷六云:“余录前后两局诸公诗,惟子常、德辅、敬初、无逸、仲简,顾侠君已采入《元诗选》,不列此集,与《诗综》体例差别。竹垞采诗时,元诗选本尚无大集,元遗老诗不妨兼收。此集义取断代,如舒道原、谢龟巢、华黄杨、沈茶山、刘仲修、贡南湖、张光弼、吴圭一、沈花溪诸人概不入选。”(第140页)笔者论明初诗,大抵遵其例,然因流派群体演变等各有具体情形,仍拈论元遗老刘永之、张昱等人,而不论王蒙、蓝仁、蓝智、陶安、张简、谢应芳、赵沅等人,此则与《明诗纪事》及《列朝诗集》体例差别。

^② 宋佩韦《明文学史》,《中国大文学史》(下册),第667页。

阁、南村、子英、子宜、虚白、子宪之流，以视弘、正、嘉、隆时，孰多孰少也？且明初诗家各抒心得，隼旨名篇，自在流出，无前后七子相矜相轧之习。”^①越中、吴中、江右、闽中、岭南五派为前期诗坛主流，以戴良、王逢、丁鹤年为代表的元遗民诗人，以袁凯为代表的松江诗群，以凌云翰等人为代表的杭州诗群，以及贝琼、詹同、刘三吾、宋讷等，为重要支流。永宣间，值太平日久，台阁派臻盛。台阁派以江右作家为主，以至出现天下诗人半江西的局面。

盛明，始正统初，终正德末，中历景泰、天顺、成化、弘治四朝，共约九十余年。英宗、代宗时期，台阁余派尚存；理学兴盛，薛瑄、吴与弼、胡居仁不仅长于理学，亦能诗。成化以后，茶陵派兴起，“台阁体”因之一变。伴随弘治中兴与正德之衰，前七子复古兴起，成为诗坛主流。同时还有两大支流：一是学人之诗。陈献章、庄 、丘濬等鼓吹风雅，陈献章、庄 等还形成白沙一派，诗称“陈庄体”。继有王守仁倡导心学，与李梦阳复古并起，形成阳明一派，诗可称“阳明体”。二是才人之诗。以吴中四才子为代表的吴中诗人，与复古派、阳明派几成三鼎足。此外，尚有郑善夫闽派再兴，南园后五子岭南派再兴。

中明，始嘉靖初，终隆庆末，共约六十余年。正德政治激变，具有偶然性历史因素。嘉靖继位，明王朝进入缓慢的衰落期。此期，诗歌与政治关联密切，后七子派与“嘉靖十才子”居为主流，阳明后学、唐宋派为重要支流，区域诗坛同样值得关注，吴中、闽中、岭南不乏杰出作者。

晚明，始万历初，终崇祯末，共约七十余年。万历初，党争萌芽渐兴。随着政局动荡加剧，社会矛盾日益尖锐，诗派群体兴废匆遽，门户壁垒丛立，争鸣激烈。后七子派衰落，公安、竟陵继兴，启祯之际，复社、几社群体起而驳斥公安、竟陵，构成此期诗史演变的主要轨迹。闽派三兴、岭南派三兴、越中诗坛复兴、山人诗大盛，为重要支流。

唐诗素有“三唐”说、“四唐”说。元末杨士弘选《唐音》、明初高棅选《唐诗品汇》，严格区分初、盛、中、晚，数百年间，“四唐”说盛行。这里提出“四明”分期，与“四唐”说不无相近处，但并非抄袭。

首先，“四明”的分期，是在综合考虑明诗发展变化、诗歌与政治文

^① 陈田《明诗纪事》，第2页。

化之关系、诗学潮流的阶段性等因素之上,归纳总结的一种分期方式,力求合于明诗演变的历史规律,便于诗歌批评研究。

其次,不沿袭“四唐”说的逻辑范式。在许多评论中,“四唐”说含有优劣高下之分。一般以盛唐最高,晚唐最低,由此唐诗呈现一种有趣的发展轨迹,即“兴—盛—衰—亡”。这一近于生长规律的理论存在不少弊端,甚至在一些诗史撰著中,唐诗俨然生来就为了向盛唐发展。“四明”说不包含这样的生长规律,而是根据创作实际,以为中明稍差一些,其他成就大抵相近。如将明初诗人“入明”前创作计入,将晚明诗人“入清”后创作计入,则前后两端最突出,中间两段有高有低。

复次,“四明”说基本避开分期所造成的文学风气与诗歌创作的割裂问题。以初明为例。明初五派代表人物大都是由元入明的作家,称得上第一代诗人。台阁派重要诗人多生于洪武改元前后,卒于宣德末前后,称得上第二代诗人。如杨荣、杨士奇、杨溥、解缙、梁潜、金幼孜、胡广、胡俨、曾棨、黄淮这十位台阁代表诗人,出生最早的胡俨,洪武元年仅八岁,最老寿的黄淮、胡俨享年八十三岁,正统改元前卒世者有解缙、梁潜、金幼孜、胡广、曾棨五人。即使三杨、胡俨、黄淮卒世稍晚,但创作黄金时代已过去。所以,以宣德末为明初下限,少有严重割裂流派与作家现象。

“四明”说较“三明”说更为具体一些。当然亦有其弊端,但作为一种对明诗的分期认识、解读方式及研究方法,或未尝不可行。

二、初明诗歌的演变

从明初五派到台阁派是初明诗歌的主流变化。这一过程,一言以蔽之,即从“元音”到“明调”。“元音”,即元末风尚。“明调”,指明初特殊历史文化形态下的诗风。

(一)洪武诗坛与朱元璋之治

诗歌关乎世运与人生,创作风尚、诗学潮流变革皆有“时”有“遇”。所谓“时”,指时代环境,“遇”指诗人与时代的关系。在“时”与“遇”中,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帝王政治的作用。对于易代之际诗坛来说,兴王影响尤其显著,初明诗歌与朱元璋的关系即是如此。

元失天下,群雄逐之。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在群雄割据中崛起,建立大一统王朝。《明史·太祖本纪》赞云:“太祖以聪明神武之资,抱济

世安民之志，乘时应运，豪杰景从，戡乱摧强，十五载而成帝业。崛起布衣，奄奠海宇，西汉以后所未有也。惩元政废弛，治尚严峻。而能礼致耆儒，考礼定乐，昭揭经义，尊崇正学，加恩胜国，澄清吏治，修人纪，崇风教，正后宫名义，内治肃清，禁宦竖不得干政，五府六部官职相维，置卫屯田，兵食俱足。武定祸乱，文致太平，太祖实身兼之。”评价不可谓不高。这里避而未谈的朱元璋另一大功绩，就是驱逐蒙元。从得民心上来说，恢复汉人“正统”，结束长期的战争，是他作为兴王得到民众承认的两大因素。朱明建立，改革社会弊端，兴文治，则是作为开国皇帝得到民众承认的两大前提。我们看到，朱元璋在宋濂等人建议下，欲广大教化，昌明文治。

诗歌作为兴王之治的一个重要层面，朱元璋做了大量尝试。解缙《顾太常谨中诗集序》载亲历见闻：“圣情尤喜为诗歌，睿思英发，神文勃兴，雷轰电逐，顷刻间御制沛然数千百言，一息无滞。臣缙辄草书连幅，笔不及成点画，即速上进，稍定句韵，间或不易一字。”^①王世贞《艺苑卮言》卷五：“高皇帝神武天授，生目不知书，既下集庆，始厌马上。长歌短篇，操笔辄韵，有魏武乐府风。”朱彝尊《静志居诗话》卷一：“孝陵不以‘马上治天下’，云雨贤才，天地大文，形诸篇翰。七年而御制成集，八年而《正韵》成书。题诗不惹之庵，置酒滕王之阁，赏心胡闰苍龙之咏，击节王佐黄马之谣。《日历》成编，和黄秀才有作；大官设宴，醉宋学士有歌；顾天禄经进诗篇，披之便殿；桂彦良临池联句，媲于颺言。韵事特多，更仆难数。惟其爱才不及，因之触物成章。宜其开创之初，遂见文明之治。”朱元璋有《御制诗集》五卷，恐不乏文臣近侍的润笔捉刀，但这些作品并非纯粹附庸风雅，对初明诗歌走向影响不小。

一是平民皇帝诗，无华贵靡丽气。《牧羊儿土鼓》、《东风》诸篇，如《艺苑卮言》卷五所说“制词质古”。这位历史上少见的农民皇帝，尚俭素，喜用实，诗亦不喜浮靡。

二是推重唐人，时有禅趣。《横秋风吹笛》等诗一派唐人气象。朱元璋早年曾出家，称帝后不避讳这段经历，且有张扬之意，率群臣听钟山僧讲经说法，择用僧人，委以官职重任。他还喜好僧诗。解缙《顾太常谨中诗集序》载有宗泐进诗百余篇，朱元璋“不竟日尽和其韵”之事。

^① 解缙《文毅集》卷七。

所作时见禅悦之趣,《游钟山》、《麋僧韵》即是。

三是标举宏大之音、高格朗调。朱元璋作为平民皇帝,诗无富丽之气,鼓吹佛教,诗有禅悦之味。这尚非其全部,兴文治仅靠这样的倡导还远远不够,故又标榜宏音朗调,以为天下先。解缙《顾太常谨中诗集序》:“上惟喜诵古人铿 炳烺之作,凡遇啾暗鄙陋,以为衰世之制,不足观。故天下之士为诗,鲜有能得上意者。”如《钟山云》,气宇宏大,有君四海、主亿兆之气。

值得一提的还有朱元璋率群臣唱和,标举风雅,喜命文臣应制,甚至以诗作为选择人材之具。唱和例子很多,具有典型意义的是甘露之咏,《醉学士歌》、《黄马歌》之咏。以诗择用人材,萧翀等以《指佞草》称旨授官即是。命文臣应制,不胜枚举。不少诗人由此获得高名,脱颖而出,林鸿就是一日诗名满京师。

上行下效,帝王风力甚巨。初明诗歌适应时运,颂圣大盛,宗唐高涨,传统诗教复兴,以及宗藩、僧家诗崛起等,都与帝力鼓扬有着密切的关系。

与此同时,朱元璋以峻法治天下。姜南《蓉塘诗话》卷一第一则《用刑》:“高皇初定天下,承胡元大乱之后,痛五教之大坏,疾四维之不张,于是用重典以治之,乃有刖膝断趾、钩背剥皮、腰斩坑醢之刑。盖不如是,则左衽之俗,染人之深,不易驱之。于礼义教化之中,亦圣人救偏拯弊之权,非众人所能识者。”《用刑》冠于全篇,自有深意。不过,单一肯定“重典”有所未当。朱元璋雄猜多疑、灭裂风藻的手段令人胆寒。洪武朝著名的案事就有魏观案、胡惟庸案、蓝玉案、空印案、郭桓案、刘三五科场案等,株连甚广。士人惧为君用,一时遁隐风气盛行,早已不是什么秘密。苏伯衡、高启、王彝、刘永之退保全身,终未逃文人之厄。王行、赵介隐居不仕,仍不免于迫害。朱元璋自己也清楚,峻法重典是一种“暴政”,颁布《大诰三编》时附发诏令:“寰中士夫有不为君用者,即有背教,杀而籍没之,不为不公。”^①所以,《艺苑卮言》卷六叹说:“当胜国时,法网宽,人不必仕宦。”

① 《大诰三编》多述惩文士“不法”之事,如“作诗诽谤”、“秀才刖指”等。《秀才刖指第十》:“广信府贵溪县儒士夏伯启叔侄二名,人各截去左手大指,拿赴京师。朕亲问之……今去指不为朕用,是异其教而非朕所化之民。尔宜泉令,籍没其家,以绝狂夫愚夫仿效之风,而伯启无对。命法司诣本贯决之。”(《全明文》(第一册)卷三十一《朱元璋三》,第702—703页)

在中国历史上,任何易代之变都是空前浩劫,易代前如此,易代后亦然。少数民族政权取代汉人政权,文士沦为鸡豕,杀之易易。汉人政权复归,倡优以畜文士,杀之亦易。朱元璋以天下私有,肆以雷霆万钧之力屠戮士庶,亦是一“独夫民贼”。明初诗人惨遭杀戮流戍,数量之众,被祸之剧,惊人心目。此略举一二:越中派宋濂以孙宋慎牵入胡惟庸案,流戍卒,子宋璲连坐死;苏伯衡坐表笺罪死狱;张孟兼以傲睨吴印死;吴沉以懿文太子故宫人事被诬死;许存仁流放韶州,后逮死狱中;郑洧以诸生度田案代兄自诬服死。吴中派高启、王彝牵入魏观案死;徐贲以犒劳过境大军不周下狱死;杨基被谗夺职,供役京师卒;张羽谪居岭南,中道召还,投龙江死;王行牵入蓝玉案死;唐肃以侍食不敬谪戍临濠卒。岭南派孙 以题画牵入蓝玉案死;黄哲以事诬误置于法;赵介以诬告逮赴京师,未及还家卒;黎贞谪戍辽东十三年始放归。江右派刘永之以家累谪戍,卒于道;萧翀被诬谪役河南十八年。《艺苑厄言》卷六历举刘基、高启、袁凯、宋濂等人不幸遭遇,叹说:“呜呼!士生于斯,亦不幸哉!”

士人还未从恢复汉人政权的喜悦中完全清醒过来,就要面临杀戮迫害的命运。朱元璋以一代明主面目示天下,又以残酷手段对待文士,可谓不仁、不武。《明史》说他“抱济世安民之志”,事实上,他对集权的兴趣要超过“济世安民”。蒙元崇尚武力,礼乐沦丧,愚民政策所造成的农民思想狭隘性,也给新王朝的士人带来深重灾难。朱元璋身上有很多劣根性,加上他本人的偏执狂,遂不惮于灭裂风雅。士人的抵制抗争大都采用辞归、遁隐一类消极手段。这也激起他忌恨士不为君用,不惜痛下杀手,从而揭开明代文人非正常死亡的大幕。尽管洪武朝禁止宦官参与政治,但后来刘瑾、魏忠贤阉党敢于疯狂残害士人,朱元璋及其子朱棣实已开其端。

在洪武政治高压下,诗人面临两种人生选择:一种是甘作倡优,糊心眯目,颂歌升平。另一种是隐居山林,疏离政治。后者不免消极,却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格。

(二)明初五派与明诗的发轫

胡应麟《诗薮续编》卷一云:“国初吴诗派昉高季迪,越诗派昉刘伯温,闽诗派昉林子羽,岭南诗派昉于孙 仲衍,江右诗派昉于刘崧子高。五家才力,咸足雄据一方,先驱当代,第格不甚高,体不甚大耳。”

一般认为五派形成于明初,不免有所误解。除闽派出现于洪武中叶外,越中、吴中、江右、岭南四派都生成于元至正间。当然,我们使用明初五派的说法也未尝不可。

五派代表元明之际诗歌的主流。诗论家常批评其沾染元末馀习,即“纤缛”、“淫哇”、“卑弱”、“沙陲弓马”风气。其实,这也不免误解。最先批评元诗之习而求变化者,正是越中、吴中、江右派诗人。其说具见王祹《跋宋、戴二君诗》、王行《柔立斋集序》、王彝《高季迪诗集序》、陈谟《缙云应仲张西溪诗集序》等文。为振兴诗坛,他们力倡复古。越中派追踪汉魏、《诗经》,吴中、江右派鼓吹汉魏、晋唐。元末乱世中诗歌空前繁荣,已超过元诗四大家的时代。

越中、吴中、江右、岭南派沾染元末习气一类的说法不确切。四派所开启的风尚是“元音”的重要构成,与宋遗民、元诗四大家等都有一定的联系,但又有不同的内涵。概括来说,特征有四:复古以求革新;宗唐以求新变;讲求诗之为用;或沉雄高古,或噍杀激宕,或清逸淡远,远离批风抹月之习。

四派的形成亦有“时”有“地”。“时”即前所说时代环境,“地”则指区域环境。越中派以金华为中心,吴中派以苏州为中心,江右派以泰和、南昌为中心,岭南派以广州为中心,此其“地”。越中派与朱元璋集团关联密切,吴中派与张士诚集团关系密切,江右派疏离陈友谅集团,饱受兵燹之苦,岭南派与何真关系密切,此其“时”。

由于原来所处“时”、“地”不同,四派入明后感受也颇异,然所面对的时运则是相同的。其顺应时变,有意变化“元音”,与闽派一起鼓扬文治,倡立“明调”。所谓“明调”,一是颂圣,宣扬“台阁之体”;二是复古与宗唐合流,借唐音鸣盛;三是振兴诗教,有“情”有“节”;四是崇尚高朗明丽之调,变化噍杀悲怆之音。就鼓吹“台阁”与振兴诗教而言,这也是他们元末注重诗之为用的延续;就复古与宗唐而言,这也是他们元末振兴诗坛的延续。由于“时”、“遇”之变,无论诗之为用,还是复古、宗唐,都有了不同的内涵。从“元音”到“明调”,是由乱世到太平的时运变化所决定的。不过,不应轻视诗人的主观选择、主动参与。如果概括五派与明诗发展演变的关系,最值得注意者,即奠立明诗基调,开启一代风气,肇开明代区域文学兴盛的先河。

(三) 台阁之诗与永宣盛世

从上面所列洪武诗人惨遭屠戮迫害的名单中,就可知五派的命运了。五派衰落,标志初明诗歌进入另一个时代。

朱元璋为巩固统治,分封诸子藩王。何乔远《名山藏》卷三十六《分藩记一》:“明兴,高皇帝以宋为惩,内域削弱,边圉弗威,使胡人得逞中原而居闰位,于是大封诸子,连亘边陲。”藩王的权位势力当时就引起士人的担忧。建文帝采纳大臣齐泰、黄子澄等人削藩之议,引起诸王强烈不满。建文元年七月,燕王朱棣举兵,名曰靖难,建文四年陷南京。靖难之变从根本上说是朱明同室操戈的权力之争,也是朱元璋以天下私有遗留的一个问题。这场内战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,也牵入一大批士人,靖难后的杀戮令人发指,齐、黄等身死,妻女给配,宗戚戮戍。文士被祸最烈的当属方孝孺、练子宁了。孝孺诛灭九族外,一时门生朋友亦被株连。孝孺为越中派殿军,其死直接关系到诗派存亡。靖难对明诗的影响远不止屠戮一大批文士那样简单,更大的影响在于改变了一代风气。初明诗歌的转换即以此为分水岭,从此“明调”呈现出一种特殊的形态。

如何评价靖难之变,是史学界长期争论的话题。我们显然应抛开篡逆无道一类的史评,重新审视这一历史事件。方孝孺等人抗节死,反映了当时文人的一种抵制态度。我们还看到许多士人接受靖难现实,他们并非没有思想,或缺乏骨气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靖难后的一些举措称得上是对洪武政治的拨乱反正^①。朱元璋以天下人皆不当其意,推行重典,民众动辄取祸。及其鼎成,士人心理相当复杂。检明初之集,少见连篇累牍的哀挽之章,与集中大量应制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。洪武政治之失,不惟士人甚明了,建文帝与朱棣皆心知肚明。建文采取诸多补救措施,颇变洪武法度,诏行宽政。假以时日,致太平不难,惜未几为靖难所挠,卒未著显。朱棣夺权后,顺应民情,改革积弊。政治上一大举措是避免重典治世。文化上一大举措是不轻易加刃于文士,不愿为君用者放之山林。另一举

^① 永乐元年四月戊申敕曰:“昔唐太宗拨乱反正,贞观盛治,近古罕伦。”(《国榷》卷十三,第900页)朱棣拨乱反正,固然以复洪武旧制,废建文变易为口号,但革除洪武之弊不言自明。此亦是顺应民心之变。

措是稽古右文,编纂《永乐大典》、《五经四书大全》等。《静志居诗话》卷一说朱棣践位“加意人文”,“内阁有三杨,翰林则有四王,尚书则东王西王,祭酒则南陈北李,观灯侍宴,拜手赓歌,呜呼盛矣”。诸如此类变化,尽管用意与效果各有不同,但补救洪武之失,还是得到士人认可的。

行伍出身的朱棣,不像其父那样标榜能诗,但亦喜赋诗以助雅兴。钱谦益极推重这位太宗文皇帝,《列朝诗集》乾集之上:“上靖难犁庭,神武丕烈,戎马之余,铺张文治。敕修《经书大全》及《永乐大典》,昭代文章,度越唐宋。御制集藏弃天府,不传人间。恭录御赐荣公二诗,以见神龙之片甲云。”所录《赐太子少师姚广孝七十寿诗》,谈不上诗才。太子朱高炽倒是富有诗才,虚怀好学,与大臣杨士奇、曾棨赓和,有文集二十卷、诗集二卷,惜在位不及一年。宣德帝标榜文治,喜爱诗歌。有《大明宣宗皇帝御制集》四十四卷,收诗六卷。《艺苑卮言》卷五说“宣宗天纵神敏,长歌短章,下笔即就。每遇南宫试,辄自草程式文,曰:‘我不当会元及第耶?’”《列朝诗集》说:“运际雍熙,治隆文景,君臣同游,赓歌继作,则尤千古帝王所希邈也。”宣德御制谈不上很高明,为人称道的《离合藏头》七律大抵是文字游戏。《潇湘八景》、《瑞香花诗》、《水亭偶成》时有清和平澹之致。不过他对明诗的功绩不在此,而在作养循吏,柄清明之政,使诗人获得一个国尚文治的生存环境。《诗薮续编》卷一说:“宣庙好文,海内和豫,虽大手希闻,而名流错出。若曾子启、刘孟熙、张静之、李昌祺及闽中诸王辈,皆浸润明风,解脱元习。”

但应指出,朱棣的拨乱返正是有限的。即位初的杀戮令人发指,继兴厂卫,颇有监天下之人、钳天下之口的意思。《明史·刑法三》:“东厂之设,始于成祖。锦衣卫之狱,太祖尝用之,后已禁止,其复用亦自永乐时”,“故即位后专倚宦官,立东厂于东安门北,令嬖昵者提督之,缉访谋逆、妖言、大奸恶等。”如果说明代敢于大肆屠戮士子,朱元璋开其端,则勇于杜天下之口,朱棣肇其始。既然如此,永乐诗人还是没有获得思想自由与表达自由。

永乐间,越中、吴中、岭南、江右派式微,老成宿望凋零,以江右诗人为主体、以“三杨”为核心的台阁派继兴。台阁诗人文化心态是独特的,一方面既讲求世用,又好山林之趣;另一方面,既推重温厚和平,又

不乏劲节。造成这一独特心态的原因,首先是他们未亲身感受元末乱离,青年时期对洪武政治则有切肤感受,向往开明之治;其次是值太平日久,经历大都不复杂;再次是与江右派多有师承关系,犹存前贤遗风。其诗称“台阁体”,有两大近源:越中派“台阁之体”;江右派和平之诗。其胎息尤在江右派。

洪武诗坛,颂圣是洪波巨流,但不乏隐然的哀怨、清逸的江湖、古质的山林,还有元遗民的易代悲歌,贰臣隐约含悲、欲言还止的吟唱。进入永宣后,尽管宗唐仍在延续,和平、温厚、清雅已成为主色调。“台阁”与“山林”合流也是时代的标榜。诗之为用职能范围缩小了,诗教一定程度上被庸俗化。当然,台阁派不乏名家,遁隐的山野诗人还有一些^①。宣德帝“夙夜念之”,《招隐歌》:“嗟尔贤人,何乐空谷”,“嗟尔贤人,无为徘徊。石泉麋鹿非尔伍,风雨天路为尔开。”^②不过,山野诗人已成盛世的一种点缀了。我们肯定“台阁体”的价值,但不得不指出此风笼罩诗坛,诗歌沦为政治的附庸、才学的展示、逸士的清玩,一定程度上剥蚀了明诗的生机活力。物极必反,这也为茶陵派、前七子派、白沙一派、阳明一派的兴起做下铺垫,积蓄了能量。

三、关于初明诗人的失语

由元入明是明诗演变的大关目。在从“元音”到“明调”的诗史演进中,还形成一种典型的集体失语现象。所谓失语,指失去自主意识,或归于沉默。初明诗人失语,这两种情况都有。

前一种情况很普遍。历史进入新王朝,先行者歌功颂德,润饰太平,附丽者蜂拥附和,颂圣骤盛。颂圣,代代有之,明初潮流声势浩大,作品数量庞巨,远超前代,唐初、宋初皆远逊之。朱明创立是一种以新革旧的“革命”,百废待兴之际,新朝气象、大业勋绩是这个时代引人注目的话题。从诗之为用角度来说,写一些歌颂文字,制造一些气氛,即

^① 《列朝诗集》甲集第二十二所载昆山龚诩即其人。父督洪武间官给事中,谪戍死。龚诩年十四从伍,调守金川门。靖难后,变姓名遁归,匿大困中读书。迨禁稍解,卖药授徒为生。两荐为学官,皆不赴。无子,独与一老婢居破庐,歌咏自得,年八十八卒,门人私谥安节先生。《列朝诗集》选诗十四首,如《饥鼠行》、《咏纸被》、《甲戌乡中民情长句寄彦文布政》诸篇(第1154—1156页),不惟有山野之气,且可论其世。

^② 钱谦益《列朝诗集》乾集之上,第15—16页。

使场景很热闹,也无可厚非。问题是颂圣历久不衰,本来就像调和五味的盐醢,至此成了少之不得的食粮,充斥坛坫,甚者拿它装点门面,邀名逐利。当诗人无视现实,模山范水,咏史题画,作乐府、宫词也都离不开它时,问题就十分严重了。在颂圣洪流中,诗歌失去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,难免被抽空灵魂,沦为庸俗的工具。因此,明初洋洋大观的颂圣多“呾语”。颂圣行列中不乏清醒者,如刘基、高启等。但刘基最终放弃元末所倡的“美刺风谏”精神,高启则改变往日鹰隼飞扬的气魄。他们对朱明新气象的称许,感情真切,但其以诗坛领袖身份参与颂圣,造成的负面影响难以估计。

后一种情况也很典型。沉默大抵是对现实有清醒意识或抵制情绪。经过数十年战乱,天下复归一统,而政治高压与种种不合理措施使得新时代又充满另一种血腥气息。重典威劫造成灰色调的社会氛围,诗人甫脱乱离,就陷入新的痛苦。许多人远离政治,啸傲山林,既为全身,亦为持守自由。沉默不意味全然消极,苏伯衡、袁凯的勇退难进,即是不肯随波逐流。他们寄情山水诗画,保持真我本色,置身颂圣洪流之外,与时代政治的调子不相合拍。朱元璋建士不为君用之法,非无来由。

初明诗人失语原因种种,前已述及,此再简作归纳:一是新朝创立,诗人迎来统一,实现汉人政权理想,卷入颂圣洪流,以至失却故步。二是兴王对颂歌怀有期望,并懂得颂圣的意义。朱元璋很早就明白文、武兼用的道理,与张士诚、陈友谅的争战,不仅在意土地的得失,而且留意人材的罗致。攻占婺州,即召用一时名士。江西内附,广征人材。洪武建元,屡下诏求贤,从他强迫杨维禎一至南京,就可见用意之深。此外,躬自赋诗,引领风雅。效果是很明显的,颂圣在其引导下盛极一时。三是政治威劫。按照朱元璋的意思,士不为君用即是不忠,杀之可矣。他重刑治天下的手段,使人避之有恐不及。诗人即使逃遁山林,亦非安居,岂有不失语的道理?四是文坛领袖的作用。刘基、宋濂、高启、刘崧、林鸿的颂圣表现以及小心谨慎的态度,对初明诗歌影响不小。诗坛大纛已不免,更遑论其他人了。

永宣诗坛仍未摆脱“失语症”,除时代政治文化、诗歌风尚等具体原因外,也与传承洪武诗风有着一定的关系。

四、初明诗歌的价值

关于初明诗歌,褒贬不一,议论纷纭。赞者称可追比唐人,为明诗最盛。陈田《明诗纪事》即是。贬者谓沿宋元余习,尚未一归于正,甚者称“明初无诗”。对于这种批评,连杨慎、王世贞都鸣不平了^①。初明诗未能大盛的说法,清代犹然流行,沈德潜、周准可为代表。沈德潜《明诗别裁序》:“洪武之初,刘伯温之高格,并以高季迪、袁景文诸人,各逞才情,连鑣并轡,然犹存元纪之余风,未极隆时之正轨。永乐以还,体崇台阁,骫骳不振。”周准《明诗别裁序》:“夫风裁不具,洪、永所以未极于盛,体貌徒存。”沈氏借助“四唐”说,综合陈子龙、钱谦益、朱彝尊之论,自谓公允。其说迄今犹多信奉者。然这由“大雅”、“诗教”衡量出来的明诗升降盛衰图,究竟有多少可信性呢?清代女诗人汪端就曾提出质疑^②。我们随手还可拈出不少疑点:沈氏批评初明诗斗逞才情、不脱元习,将复古归功李、何,殊不知刘基、高启元末已倡复古,刘基甚至鄙弃唐、宋,独推《诗经》。至于论晚明“正声渐远”,将亡国罪加于公安、竟陵,与钱、朱同出一辙,此不待辩。显而易见,他衡量明诗的标准本身就值得辨说,至于以唐诗标准来选明诗,此亦不论,仅着重指出明诗的价值不能单纯用“大雅”、“诗教”、“宗唐”一类准绳来品定。

近百年来明诗研究对前人之论进行了较深入的反思。不过,具体到初明诗歌的评价上,仍存在不少误解。这里简单提出几点看法:

一是元诗价值并非如明中叶以来诗论家所说的那样小。明末徐《张思廉玉笥集》:“胜国人才之盛,超宋接唐,当时善鸣者凡数百家,皆流丽逸宕,以情采风致胜。”^③为力排众议而夸大言之。乾隆间,沈钧德《元诗百一钞序》:“盖宋诗末流之弊也,为粗率,为生硬,元诗则反

① 杨慎《丹铅续录》卷十《胡唐论诗》:“近日好高论者,曰沿习元体,其失也瞽;又曰国初无诗,其失也聋。一代之文,曷可诬哉!”王世贞《艺苑卮言》卷五:“而谈者尚以元习短之,谓辞微于宋,所乏老苍,格不及唐,仅窥季晚。然是二三君子,工力深重,风调谐美,不得中行,犹称殆庶,翩翩乎一时之选也。”(《全明诗话》,第1933页)

② 汪端之说见《明三十家诗选》。宋佩韦《明文学史》:“沈氏的批评,未免有门户之见,颇为后人訾议,汪端就很不服气,她质问沈氏说:‘然则必如空同古诗,沧溟乐府,摹拟短钉,局促辕下,乃可谓直追大雅耶?’”(《中国大文学史》(下册),第681页)

③ 徐《重编红雨楼题跋》卷一,第39页。

是。欲救宋诗流弊,舍元曷以哉!”辩驳苍白无力,原因就在借一派打击另一派。你借打击宋诗抬高元诗,他借打击元诗抬高明诗,自然会有人借打击明诗抬高清诗。这一批评方式实不可取。近三十年来,人们逐渐认识到元诗的价值。客观地说,明诗承元诗而来,是值得肯定的。

二是论者谈文学升降兴衰,喜称说唐诗、宋词、明清小说,一度造成明清无诗说盛行。今溺于此者不乏见,反不若明人李东阳视闕开阔,《麓堂诗话》:“汉、魏、六朝、唐、宋、元诗,各自为体。譬之方言,秦、晋、吴、越、闽、楚之类,分疆画地,音殊调别,彼此不相入。此可见天地间气机所动,发为音声,随时与地,无俟区别,而不相侵夺。”近年来,学界重新解读诗史,以为元、明、清诗各具价值,不能为戏曲、小说所掩。笔者既持此说,又以为具体还可这样说:“四明”各有其诗,互不相掩,不宜厚此薄彼,而应重视各时期的“个性”及彼此间的“联系”。“个性”与“联系”本身就是价值所在,前者指向诗是载情之体、艺术创造,也指向诗是心灵史、精神史,后者指向艺术的承传与变化、心灵精神的变迁与动向。

三是或谓刘基等人好诗都在元末做完了。此非空穴来风。刘基元末诗不逊金元第一家元好问。归命朱明前所作编入《覆瓿集》,此后诗编入《犁眉公集》,后集奇气减弱。《列朝诗集》采前集诗最富,《小传》反复论之,以为入明诗远逊于前。初明诗人这一现象,被概括为“诗思渐减”。这关涉到一代诗歌价值的体认,有必要予以审析。首先,判断好诗的标准有待反思。刘基入明诗有变,奇肆不复,且很少创作乐府。但应看到歌行依然作,这也是他的擅长。其歌行题画,境界开阔,很有感染力。高启原本长于乐府、歌行、七言古,洪武初《姑苏百咏》则标志其绝句新境界。《凤台集》不少篇章不逊《青丘子歌》。因此,没理由说他们的好诗元末已做完。其次,诗人命运值得注意。洪武七年,高启被祸死,翌年刘基病逝。诗虽与研经不同,但以数年之力与数十年之功相比,自然不适当。而且将一个完整的诗人分割成两截,轻视诗歌人生的连续性,也不尽合理。再次,元末与明初是时间概念,也是历史概念,由于时代环境变化,创作发生变化,是极自然的。

四是从内容题材来看,初明诗歌价值是多方面的,包括咏史、题画、宫词等方面的创新,也包括纪实、写怀等方面的创新。对于颂圣,

不必一概驳到,它毕竟是从雅颂传统来,对明代文治之兴有一定的推动作用。

五是论初明诗歌,不只看艺术的高低,滋味的厚薄,还当重视它作为一代心史,承载时代精神、历史文化的意义。就诗以存史来说,即独具价值。正史的可信度是困扰史学家的大问题。《元史》、《明史》多诬说曲解,这很大程度上是由编纂者受限于特殊政治文化语境所造成的。如《明史》中的《张士诚传》、《陈友谅传》、《方国珍传》等,采用清人汪琬所撰列传稿。汪琬围绕朱明“正统”作传,虽有良史之才,却不免丑化张、陈、方等人。初明诗歌从另一角度反映这段历史,可纠补正史阙谬。尤其是,史书呈现一系列历史事件,史学家亦征引诸说以作史评、史断,但史学作为人学的一个层面,缺乏心灵的表达,也是不完整的。因此,初明诗歌不仅是一部知识分子心灵史,也是一部别具风貌的历史。

总之,初明诗歌有其重要的文学价值与人文价值。对历史上易代时期的诗歌,我们应多关注相关的人文复兴问题。旧时代把人变成鬼固然司空见惯,然新时代也极少能把鬼变成人。幸赖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致力人文重建,虽九死而不悔,始能见出时代的一些新来。洪武诗人以其热情参与政治,以其冷寂自处山林,所树立的礼乐、道德、人格典范,正是永宣文治形成的重要基础。台阁诗人由此推毂一代文治之盛。即使从诗以人存的角度,也应给予他们公允的评价。

第二章 越 中 派

越中派,即元末明初刘基、宋濂、苏伯衡、王祯、胡翰等人为代表的浙诗派。明清画论有浙派一说。至于浙诗派,史无成说,明人俞汝成仅有含糊的说法^①。事实上,元末明初浙人不仅以画著称,诗文亦世所重。胡应麟标举五派,有“越诗派昉刘伯温”之说。《明诗综》、《四库提要》承之。现代学者接受胡氏之说,以越诗派为明初五派之一。当前学界又多以浙派指称清代黄宗羲、厉鹗等人为代表的诗派^②。明、清两个浙诗派,无论诗学思想,还是具体创作,都颇有不同,因此不宜合称浙派。为区别之,此称刘基、宋濂一派为越中派。本章对越中派兴衰、复古思想、诗歌创作简作探讨。

① 董其昌《画禅室随笔》卷二:“元季四大家,浙人居其三。王叔明湖州人,黄子久衢州人,吴仲圭钱塘人,惟倪元镇无锡人耳。江山灵气,盛衰故有时。国朝名手,仅仅戴进为武林人,已有浙派之目,不知赵吴兴亦浙人。苦浙派日就渐灭,不当以甜邪俗赖者,尽系之彼中也。”徐沁《明画录》卷二:“今鉴定者不溯其源,止就吴、浙二派互相掎击。究其雅尚,必本元人。孰知吴兴松雪唱提斯道,大痴、黄鹤、仲圭莫非浙人,四家中仅一梁溪迂瓚。然则沈、文诸君,正浙派之滥觞,今人安得以浙而少之哉!”朱彝尊《明诗综》卷三引俞汝成语:“忠文诗平易切实,然在当时,与宋潜溪首倡浙东,功不可泯。”(第126页)

② 严迪昌师《清诗史》第二编第五章《查慎行论》第一节《“浙派”辨》:“清代诗有‘浙派’之说,究其实乃是清代前期‘宗宋诗派’这一模糊复合概念的别称,并非涵盖有清一代浙籍诗群之总体。既然浙人不尽宗尚宋风,宗宋诗者亦非仅止浙人,何以有此别称?这是因为‘宗宋’得以成其为流风,第一次足能与‘宗唐’相抗衡,其肇始固由浙人,鼓荡张扬亦多浙人,而且此种风尚在两浙绵延相承,代有推进,几与爱新觉罗氏王朝相始终。”(浙江古籍出版社,2002年,第556页)张仲谋《清代文学与浙派诗》:“浙派,自清初黄宗羲创始,历经康、雍、乾三朝,前后百有馀年,涉及诗人数以百计,大小名家数十人,下开清中叶之桐城诗派,晚清之同光体或宋诗派,影响至为深远。无论在清代诗坛上还是在中国诗史上,它都可以说是最大的诗歌流派之一。”(东方出版社,1997年,第2页)